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十三经开讲】

论语开讲

张善文 马重奇◎主编
汤化 张翌◎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十三经开讲】

论语开讲

张善文 马重奇◎主编
汤化 张璽◎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语开讲：大字版/汤化，张墨著．—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5.11

（十三经开讲/张善文，马重奇主编）

ISBN 978-7-5002-6437-8

I. ①论… II. ①汤… ②张… III. ①儒家 ②《论语》—研究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5301 号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中国盲文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大字版。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论语开讲（大字版）

主 编：张善文 马重奇

著 者：汤 化 张 墨

出版发行：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65 千字

印 张：27.5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02-6437-8/B·285

定 价：44.00 元

销售服务热线：(010)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十三经开讲》修订版弁言

张善文

费时半载，《十三经开讲》终于修订告成，有以呈献于读者了。

这是一套以浅显简易的语言述谈十三经的小型丛书，旨在与当今的青年读者共同研讨这十三部极具历史文化意义的中国古代经典。全书沿承“开筵讲习”的传统教学理念，力求遣词平白，用语轻松，于素淡通俗的氛围中展示经典深永奥雅的学术精神，故题曰“开讲”。

此书十五年前曾以《十三经漫谈》为题，由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在台湾学界产生过较为良好的学术影响。今复作全面修订，提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改版刊行。本次修订，除了更名为“开讲”，将繁体字改为简体之外，另有如下几方面侧重把握：即细校引文、详审观点、润色辞采、充实资料、增补内容，总以严谨缜密为本，期盼推出一套精益求精、富有启迪意义的十三经入门读物，以裨益于学术教育界，繁荣并发展今日国学研究之芬馨文苑。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有云：“经稟圣

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这几句评述尽管带有往昔学人的尊经心愆，但还是颇为客观地说出了“经”的至为崇高的历史地位，值得我们平情思量。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经典浑厚悠远的学术价值，仍期待着众多华夏学人的不断研探与发掘，其永恒的思想晖光必将更加灿亮地映照于人类学术文化之林。

二零一三年三月

写于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

总序

张善文

十三经者，我国五千年悠久辉煌的民族文化宝库中最为精粹的十三部经典著作之总称。

先师黄氏六庵教授（讳寿祺），昔有《群经要略》之作，其书《自序》尝综述诸经之特色云：“余以《尚书》为吾国最古之史，亦吾国各体散文之祖；《诗经》为韵文之渊藪；《春秋》为记事之宝书，此三经于文史关系最钜。”又曰：“近世《礼》学废绝，专业者至稀，而讲《孝经》者亦每失其义。《论语》、《孟子》支配吾国人思想者垂二千年，昔则家弦户诵，今至大学文史系学生竟罕能举其篇目。《尔雅》关乎文字训诂，不识字何以读书作文？”又曰：“独《易》道广大精微，见仁见智，无体无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为典要，惟变所适，初学难以极深研几。”这几句话十分精辟地点明了群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内容特色，并指出近世学者对经学研究的荒疏与缺陷，其言辞之间，不无激励后人当珍视国学而努力研治之良苦用心存焉。

一九九三年夏末，我与罗莹兄赴台湾访学，幸识台

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陈清荣先生，与之论及中国经学后继乏人的现状，并提议倘能编撰一套简说十三经要义的普及丛书，必将引发今日青年一代治经的兴趣，且将有益于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之千秋大业。陈先生闻毕此论，至为赞许，嘱我及早安排编撰事宜。是为《十三经漫谈》之最初编撰缘起。

越二载，一九九五年初夏，我以出席台湾大学与台湾易经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之机再度赴台，又趁暇与陈清荣先生深入商讨《十三经漫谈》的编写步骤，承其全力支持，遂落实了此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规划。是年回福州后，我即邀马兄重奇教授共同担任主编，并请罗莹、郭丹、徐启庭、翁银陶、徐六符、汤化、陈节、林志强、黄黎星、刘松来、谢金良、杨志贤、巫少鹏、叶全君等诸位同仁分经撰写，历时一载有奇，经过多次研讨商榷，今喜各书已相继完稿待梓，而诸位撰稿人所付出的努力亦将转化为有补于社会教育之学术成果矣。

中国古代之言“经”者，乃典型常久之谓，故“经典”二字常被联用，而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遂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先秦时代，我国有六经之书，即孔子授徒所用的《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春秋》六

部典籍。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乐经》亡佚，故西汉复兴经学，仅立五经博士。稍后又曾将《论语》、《孝经》增列为学官讲经之典籍。及至唐代，学官所立，于《礼》中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于《春秋》中分《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乃成九经；嗣又增入《论语》、《孝经》、《尔雅》，皆刻石于国子学，于是有十二经之名。有宋一代，程颐、朱熹诸儒出，更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配《论语》、《孟子》而合为一帙，谓之《四书》，则《孟子》亦入“经”矣，此后风行天下之十三经遂以《孟子》殿焉。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学者阮元编校《十三经注疏》之后，这十三部经典更进一步受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乃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最集中、最深邃、最典型的象征。

略考十三经之编次，依前儒成例，分别为：《周易》第一，《尚书》第二，《诗经》第三，《周礼》第四，《仪礼》第五，《礼记》第六，《春秋左传》第七，《春秋公羊传》第八，《春秋穀梁传》第九，《论语》第十，《孝经》第十一，《尔雅》第十二，《孟子》第十三。本丛书的编纂，即以此为序。各书的撰写，力求简明通俗，浅显生动，言之有物，以合“漫谈”之宗旨。然因诸经原有深浅难易的区别，加以撰稿者分析角度的差异、行文风格

的不同、学术水准的未臻一致，或许仍存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凡此，则至盼读者及学术界各领域之大雅君子的不吝赐正。至于整套丛书面对今天的青年读者，以向他们普及中国经学常识的撰述原则，我想各书的作者一定是兢兢业业地认真把握的。

欲治中国学术者，必自群经始。但研治经学绝不可盲目，务必明确入门的途径，掌握正确的治学方向，才能自立于学术界而有所建树。此即宋儒程颐所谓“见得路径”，“立得一个门庭”之意。先师六庵教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研究室演讲《论易学之门庭》时，曾强调指出：

读经须先立得门庭。所谓门庭者，便是从师讲问如何下工夫，如何读书。再伸畅其说，便是凡治某一种学问，必须求师指导一了当之途径，使不至迷罔眩惑。若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也。（见《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黄寿祺、张善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先师之学源于章氏太炎先生，为章门再传高弟，曾受业于礼学名家吴检斋（承仕）先生、易学大师尚节之（秉和）先生等学界宿儒，其所论析研经之道，允为前辈学者治学的至理名言。今值本丛书完稿之际，谨以先师的教诲奉献给有机会读到本书的朋友们，庶可与他们共勉，

也期望本书对年轻读者研读十三经有较多的帮助，更期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跨世纪的新一代学者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瑰丽的学术之光！

公元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岁在夏正丙子大暑后七日

前言

《论语》是一部以记载孔子言论为主的语录体著作。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主张，除了在他所整理、修订的文献典籍中有所寄托外，更主要、直接的体现，便是在他从事各种活动、聚徒讲学时的言论中。先秦、两汉以后的各种典籍，往往有许多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但其中有些是出自后人的追述和传闻，难免变味和走样；有些甚至出自杜撰、伪托，不足为信。而《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直接或间接记录，虽远未尽孔子一生所言，但可谓精华所在，堪称“正宗”之典。在这部大约一万六千字的语录汇编中，大体包含了孔子关于社会、政治、哲学、伦理、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主张，构成了儒家学说体系的基本框架，因此它是“十三经”中最为直接、集中、鲜明地体现孔子这位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的经典，也是研究孔子思想及早期儒家学说的一部最权威、最可靠的典籍。

然而，我们在历史中似乎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孔子在世时，针对当时的社会，“对症下药”，提出一套“治世良方”，却始终无人理睬，他本人也凄凄惶惶，“如丧家之

犬”，到处碰壁；而千百年后，时早过，境更迁，他那帖“破方子”却反倒越来越成了“治国宝典”，甚至据说只消半部《论语》，便可大治天下，孔子本人也越来越成了圣人。还有，多少年来，我们一提起“中华传统”，首功便是孔子；而一数落起“封建糟粕”，首恶也是孔子。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西方哲人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孔子和《论语》说了一段很不屑的话：“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黑氏的不屑，我们暂且不去计较。倒是在他的不屑中，却道出了孔子和《论语》的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这是语录体的特点，也是时代的特点。《论语》基本上是简短的语录，没有长篇大论。在孔子时代，还没有私人著述，人类之有个人思想，似乎也才刚刚开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哲都还没出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似乎也无意撰写一部传世巨著。《论语》中的这些语录，是他

的日常言语，弟子后学们即时或事后随手记录下来，后来又逐渐凑合而成书的，却不小心地成了经典。这些语录，大多成了人生格言、处世警句，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还有大量积淀为汉语中的成语。仅此一端，也足见语录自有语录的魅力与价值。真理总是朴素的。

第二，“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的“常识道德”。这种说法换个角度，是否可以理解为：孔子所提出的，正是全人类普遍拥有或追求的价值观念，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普世价值”呢？如果这个理解大体不差的话，那么进一步设想，早在两千多年前，这位平民出身的哲人，就已经发现和提出了一系列至今还“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即具有普世价值并足以垂训万代的道德思想，并初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还不够伟大吗？

然而，既是“道德”，先天就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是一种“软约束”。它一靠自觉，自我约束；二靠表率，自上而下。否则就是“伪道德”。孔子的德政思想有个前提，就是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修己”，自己先当正人君子，做天下人的表率。“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因此整部《论语》，所有的道德要求，都是针对统治者（君子）的。可是在孔子那个时代，既是变革的时代，也是人欲膨胀的时代。“君子”们都忙着攻伐争霸，“率土地而食

人”，折腾着怎么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怎么让天子的“八佾”舞于自家之庭。这个时候，有谁愿意画地为牢，用个“道德”把自己约束起来？这样，孔子的德治思想无人理睬，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在孔子时代，又根本不可能出现更先进的社会和制度，孔子只能在当时的社会和制度的框架下思考，如何让这个社会 and 制度更美好更完善一些，那么他除了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良知和自觉，还可能提出更先进的思想主张吗？即便是其他诸子各家，也没有谁能超越这个框架，拿出一套比孔子更高明的、更有效制约统治者的办法。再纵观两千多年来，秦皇且不论，汉高魏武、唐宗宋祖、洪武康乾，哪个不是靠着权谋诈术，挥舞大棒，得天下、坐天下的？哪个堪称仁人君子、道德楷模呢？都说孔子维护礼制，思想保守（事实上孔子既主张维护旧秩序，也赞成有益的变革）；可那些反对旧制度的，也未必都进步；用暴力推翻旧朝而建立的新王朝，也不见得比原先好多少，有的甚至更坏，历史却只是在野心家的轮流坐庄中不断地反复循环，人民也一拨一拨地遭受着暴力和战乱的祸害。贫民出身的朱元璋，揭竿造反，一旦当了皇帝，就把主张“民贵君轻”的孟子逐出孔庙；而他建立的明王朝，对民众的统治更加残酷苛刻。可见只要是专制制度，统治者的权力至高无上，既无外力的“硬约束”，更不可能自我约束，孔子的德治思想就注定不能真正实

行，而谁也提不出跳出“周期率”的良方。即便是实行现代民主法制的西方，也同样历经专制统治的漫漫长夜，他们“学会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也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所以，要说道德治不了国，也是历史和时代的注定，不是孔子的错。孔子已经比其他人伟大得多了。

但道德毕竟是个好东西，因此越是不行道德者，就越爱标榜道德。对他们而言，这起码有三大好处：其一，可以掩饰自己，伪为“君子”，并制造“德治”假象，以示其统治的合法性；其二，己所不欲，可施于人，可以要求别人当君子，以便自己的小人之道更容易得逞，此即“伪道德”；其三，更可以占领道德“制高点”，再悄悄地加以偷换改造，便垄断了道德，成为天下道德的权威裁判者，其手中的大棒也就更加威猛无比。因此当大人们用大棒打下江山之后，发现光靠血腥的大棒并不能永保天下，秦王朝的短命就是个教训，于是他们祭起孔学儒家的大旗，标榜仁政德治，暗中却釜底抽薪、移花接木，就把大棒变成带胡萝卜味儿的。所谓“罢黜百家”，本身就是以专制暴力扼制思想自由的大棒行为，且诸子百家中，似乎唯独法家才极力排斥各家，唯我独尊，因此这种做法本身就已违背儒学精神，其真正动机和实际行为就值得研究；而所“独尊”的儒术，其实就是根据他们的统治需要，改造儒学，并杂合百家的有利成分而成的思想专制工具。汉宣帝

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这算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要仁政，要爱民，于是两千多年来，高喊“仁政”之声不绝于耳，可就是没见过几个仁政德治之朝、仁德爱民之君。所谓“霸、王道杂之”，再说穿一点，就是借“王道”之名，行“霸道”之实。开明点的，还能从儒学中挖取一点作佐料，缓和一下社会矛盾，但骨子里，是决不会放弃“霸道”的。至于“德教”，早就成了“伪道德”，作了“霸道”的帮凶，奴化的工具。比如说“忠”，这是最受专制统治者欢迎的“美德”。孔子的道德思想确实就有“忠”一条。但是孔子的“忠”有个前提或原则，就是道义，叫做“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并不主张愚忠；而到了专制主义者手里，就悄悄地淡化了道义，而嫁接以法家的君对臣绝对统治、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这个“忠”就变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不二”之愚忠了。至于女子三贞九烈、从一而终之类的说教，在《论语》中，更不着一字，却不知什么时候，就算到孔子头上了。可见，孔子思想不但从来就没被真正实行过，而且反倒被“修理”，再供上神坛，挂“圣人”之羊头，卖自己之狗肉。其实不止孔子，任何思想家的思想，一旦有了利用价值，也都难逃被“修理”的命运。他们这样做有何道理，或许也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且另当

别论。这里只是想表明：他们的归他们，孔子的归孔子。然而，毕竟还有无数的包括统治集团中部分成员在内的天下仁人志士，博雅君子，他们自觉汲取孔子思想的真谛和精华，并融会诸子百家，发展儒学，弘扬正气，笃志修身，崇道实学，以其高尚的人品道德和文章事业，为天下所传诵，为后人所景仰。正是有了他们孜孜不懈的躬行砥砺，并与广大民众的善良天性相互维护、彼此滋养，才使得孔子的道德理想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以传承和发扬。这就无怪乎“功也孔子，过也孔子”了。

如今，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类已经找到了“将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办法。正如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所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当年孔子和其他任何一位思想家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的。而有了这条新路，统治者的权力得到有效的约束，孔子的政治思想、道德主张以及其他学说，就可以真正放射出真理的光辉。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和一些先进的国家里所出现的文明景象，也已经或多或少地印证了孔子思想基本原理和一些具体主张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近年来，社会上兴起“国学热”、“读经热”和“《论语》热”，也表明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孔子思想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肯定、重